

西行感悟

杨世忠

一、经过

2013年7月,校工会组织两个团队,分别对西线和北线两个方向开展教师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活动。我是西线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共20人,由各院系教师和工会干部组成。调查活动经停地点分别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晋陕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陕西省延安市、陕西省榆林市、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和鄂尔多斯市。行程6天。

在大寨,我们参观了当年中外国家领导人的居住地,登上了虎头山,考察了当年大寨人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成效,参观了大寨民俗馆和陈列馆,拜谒了陈永贵、贾进才和郭沫若的安息地,走进了大寨人居住的窑洞,与贾进才老支书的遗孀宋丽英老人拉家常,与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和昔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座谈。夜晚,有的团员还与大寨村民一起在广场上跳舞。

在壶口,大家于黄河东侧近距离观看并拍摄咆哮的瀑布自北向南跌宕而下,领略柔弱的河水在遇到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气势。

在延安,我们参观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驻地杨家岭和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大学校史馆,走近了延河,住进了窑洞,目睹了延安周边山坡的绿化成效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市容市貌,与延安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座谈,共同回顾学校的历史并探讨地方高校如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车行黄土高原,听导游沿途介绍陕北的历史、民情与风俗,实地观察人类对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油气开发与山区水土保持和绿化情况。

在榆林,现场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女民兵连治理毛乌素沙漠的补浪河基地。当看到昔日的荒沙野地变成今日的10万亩绿洲时,大家无不对创业者们的丰功伟绩肃然起敬。榆林是塞外的小北京,不仅街道尚留明清古风,而且素有“大漠边城”的汉唐历史,站在镇北台城墙上向北眺望,已看不见昔日毛乌素沙漠的黄色汪洋,只见绿色大地上点缀些露头黄沙。市水务局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榆林地区的水土保持和绿化建设情况。

在鄂尔多斯高原,我们参观了成吉思汗陵园、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和东胜城区,

并经鄂尔多斯新机场返回北京。

二、感悟

1. 大寨的感悟

感悟之一:领导者的胸怀决定组织的事业发展高度。老支书贾进才当初如果没有胸怀,容不下陈永贵这个外乡人,也不给他施展才华的平台,就没有了大寨人后来的创业辉煌和举世闻名。同样,陈永贵要是按照老一套的规矩,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就不可能让郭风莲这个从外村嫁到大寨的媳妇来担当铁姑娘队队长,也没有了郭风莲带领大寨人致富奔小康的后来。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寨人今天对老支书贾进才的崇敬不减当年,为什么大寨人在做旅游纪念品生意的时候争先恐后地要将游客介绍到老支书的遗孀宋丽英的小店那里。

感悟之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害死人。毛泽东主席当年提倡“农业学大寨”,如同号召大家“工业学大庆”一样,其实质是要学习大寨人和大庆人立足于自己的脚下,以“在灾害面前不低头、困难面前不服输”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苦干加巧干,赢得改造自然、改造环境的胜利。因此,学大寨最重要的是学大寨精神,而不是形式。注重形式的东西总是长久不了的。把领袖人物的指示当作“圣旨”,注重轰轰烈烈的贯彻形式,是中国式官僚主义的典型特征。所以,反形式主义总是要与反官僚主义相联系。当年大寨之兴,既是因为有了领袖的号召,更是因为有了各级干部的大力推动,甚至于重形式、轻实质地过度推动;后来大寨之衰,不仅由于大寨的带头人在政治领域的沉沦,更是由于大寨模式本身的局限。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用人拉肩扛、垒石筑坝造梯田(地)的方式来治理,确实是改善大寨人生存发展环境的有效方法,可是,一旦将这种方法或模式不讲条件地进行全面推广,而且再夹杂着谁要是不积极造梯田谁就是不认真学大寨,甚至于就是在政治上不紧跟毛主席的因素,便是形式主义盛行,使得有些地方的森林遭砍光,有些地方的湖泊湿地被消灭、生态环境受破坏,相当多的引水渠里没有水,单一作物低效益,使大寨模式注定难逃厄运。2 000 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欲速不达,过犹不及”的话。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此不屑一顾,热衷于形式主义,热衷于把一件上级领导指示的事情往过头里做,大有不把事情做死就不罢休之势。任何事情,即便是真理,只要往极端方向推,就一定会弄砸。

2. 延安的感悟

感悟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政党,不仅其宗旨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其生命也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还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决策制度,只要是使党员、党员干部和普通的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把党看成是“自己人”,看成是实现自己切身利益的希望所在,党就无往而不胜,任何艰难困苦、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奈何

不了；反之，如果群众把共产党看成是统治者、官老爷、拥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那么党的生命就堪忧了。国民党没有败在日本人的武力征服之下，而是败在充分接收和享受了抗战胜利果实之后；苏共没有亡在 14 国武装干涉、德国法西斯入侵以及强大西方阵营的武力威胁之下，而是败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崩溃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如果不能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的本色，不能帮助人民群众实现其所追求的利益，不能取信于民，则必然要被人民和历史毫不留情地抛弃。

感悟之二，无论执政党如何表明自己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只要在实际行动中与民争利，就会失信于民。唯有自力更生，在努力解决自己生存问题之余还能帮助群众解决生计，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各路人马汇集到贫穷的山沟，根据地的物产本来就不丰饶，人民群众仍然处在普遍的贫困之中，一下子要供应那么多的军队和党政人员的衣食住行，负担肯定超重，即使打土豪、分浮财也不是长久之计，指望外部援助更不靠谱。斯时，毛泽东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军队不仅完全做到自食其力，还有余力帮助政府和群众，南泥湾精神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有人以为南泥湾精神就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对！南泥湾精神是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精神，它与最崇尚自由开放的美国人的自立自强精神具有相通之处。陕甘宁边区的市场经济与商品交易在共产党到来之后更加繁荣，并且还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正是最好的说明。

感悟之三，别看延安山沟小，却能容纳大天地。首先，它是中国当时实行民主最彻底的地方——穷人不受歧视，妇女不受压迫，人人生来平等，人民组织起来当家作主，老百姓敢说、敢唱、敢批评，知识分子献计献策、八方来归，国际友人来去自由、采访公开。这种将人民组织起来的有序民主，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盗匪猖獗、人民各逐其利、一盘散沙的社会背景下是真正的民主。其次，它是中国当时政府最清明廉洁的地方——干部没有森严的等级和衙门习气，时刻受到党组织、群众组织和党外人士的监督，行政人员秉公办事有章法可依，人们的收入差距小，心理距离更小。基于当时刚刚掌握政权的行政执法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很难想象会出现或容忍不久前出现在延安街头的城管踩踏商贩头颅的事件。再次，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甚至大洋彼岸，没有听到当地人瞧不起外地人并排斥外地人、南方来的红军和外来干部瞧不起陕北红军和当地干部的故事，大家为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齐心协力把救国救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感悟之四，延安的精神及组织的文化，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文化基因。美国作家斯诺在 1936 年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时候就前去采访，他利用采访所得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一个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经历和他们的理想。在书中,他大胆地预言,中国的未来属于奋斗中的共产党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比起国民党及其军队、比起已经入侵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不知要弱小多少,斯诺竟然做出那样的判断,这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夺人眼球,而是他有比较、有亲身的感受、有理性的思考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历史证明了斯诺判断的正确性。斯诺判断的依据并不是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和军队的装备、人数战斗力,而是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是共产党和军队组织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办红军大学,到了延安,不仅办抗日军政大学,而且还举办了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选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军队区别于中国其他政党军队的根本特征就是具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为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战。当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战士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为什么而奋斗而作战的时候,这个党、这支军队就有了灵魂,组织的文化基因就形成了。

感悟之五,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生存与发展不可分离;发展是硬道理,生存同样是硬道理。没有先进政党的生存发展,就没有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未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联想。那是一幅红军将领身穿国民革命八路军制服的大照片。从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以后,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双方血腥厮杀了整整十年。十年的仇人变成上下级,红军易帜改名,归入国民革命军系列,这个弯好难转!仔细想想,如果为报仇,共产党与张杨联手,杀蒋介石打中央军,未尝不可。那样的话,共产党的生存状况虽然能得到一时改善,但是难于得到根本改善,谈不上日后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军队之间大规模的相互残杀,只会令早已吞并了中国东北、正在华北滋事的日本军队受益。清朝亡明的历史一幕,很可能以新的形式再度重演。所以,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救敌魁、泯恩仇、改旗帜,才有了后来的发展与今天。人们不难从1972年的中美走近、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一国两制”构想和港澳回归等等历史性事件中,看到当年的陕北路经。

3. 榆林的感悟

20世纪70年代,在榆林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的组织下,一支由农村青年妇女组成的女子民兵连开进了补浪河沙丘地区,她们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一边治理沙漠,成为当时抑制沙进人退、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面旗帜。今天,女民兵们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已经成为一片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绿洲。10万亩根植于黄沙之上的林地里,已是道路纵横,人烟不绝。圈养的羊群和生长茂盛的农作物给定居于此的人们带来财富和安稳的生活。我们没有能够看到补浪河治沙示范基地的投入产出账目,无法从经济的角

度来评估这种半军事化治理沙漠的成效,但有三点可以肯定:第一,此地确实做到了人进沙退,生态环境改善,变不毛之地为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绿洲;第二,这种治沙模式来源于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和南泥湾精神,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云南、新疆、黑龙江等边疆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农场有相似之处;第三,这种模式不是一家一户的移民甚至小规模的人群移民能够做到的。

由此联想到,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范围内,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是人烟稀少甚至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集聚,在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这些地区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道路交通拥挤,房地产价格飞涨,由于生活和工作空间狭小而带来的竞争与焦虑加剧,功利意识大大强过规则意识而导致混乱等等。学界公认中国国家政权的产生源于夏禹。夏王朝是建立在上、中、下游诸部落分工协作共同治理大江大河而获得成功的基础之上的,中央财政的形成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即“禹铸九鼎,任土作贡”(《尚书·禹贡》)。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调度和使用财政资源,而且可以对人口的增长和迁徙进行引导。在对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稀缺的自然环境、国家自然保护区、城市附近的生态涵养区等,要停止移民并制止非法移民;对于可供开发的秃山野岭和荒漠化地区,则利用行政与经济的综合手段以及市场规律进行引导,鼓励人们去开发并改变那些地方的生态环境。

4. 鄂尔多斯的感悟

感悟之一,机动胜固守,交往胜闭关。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农耕民族对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高于游牧民族,社会分工更细,文明程度更高,人口众多,生存环境也更优越,但是在军事上,除了汉武帝与隋唐少数时期以外,农耕民族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便修筑万里长城也很难挡住塞外游牧民族的铁蹄。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究其原因,就是机动胜过固守,交往胜过闭关。成吉思汗效仿狼群战法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纵横欧亚大陆,一是靠部队的机动性、组织性和战斗力强——每个士兵配备数匹善于奔跑负重的蒙古马,携带干粮轮番骑乘,昼夜兼程数百里,使其可以大范围机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集生产与战斗为一体的生活方式使其训练有素。二是靠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打开其商贾通道,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人员、物资、文化的往来与交易。中国农耕民族历朝历代耗尽人间财力而修筑的万里长城,最后是在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血脉为一体的康熙皇帝时期才废弃的。

感悟之二,资源型城市如果不能完成产业转型就会随着资源的耗竭而衰亡。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黄河几字弯的中央,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来回拉锯的地方。这里夏天牧草丰美,为成吉思汗所青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气候条件有利于阿

尔巴斯羊的生长,盛产素有软黄金之称的羊绒(开司米),鄂尔多斯羊绒产业因此而兴起。在地表资源所孕育的羊绒产业方兴未艾之际,其地下的煤炭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又被开发出来。一时间,鄂尔多斯成为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也拉开了架势,尤其是康巴斯新城区的建设更是大手笔。举债发展的方式和升温过快的房地产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许多工程停了下来。其实,只要地下的资源开发源源不断,财务方面控制好,鄂尔多斯发展前景依然可期。真正的危机是在当地资源耗竭殆尽或被其他非当地资源替代以后,如果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还不能把城市建设成为宜居之地并完成产业转型,城市的衰败才不可避免。